

侗布技艺历史变迁

张国云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依据文献资料对侗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侗布发展特点的分析,寻找侗布技艺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侗布从结草成衣、织布制衣、五色斑布等造物过程中创造出编、染、织、绣等技艺手法,形成了侗族服饰的材料语言和造型符号。基于文献梳理,认为以亮布作为古老侗族的服饰符号并不十分恰当。通过对侗布技艺历史变迁的研究,为侗族传统服饰材料和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研究依据。

关键词:古代侗布;技艺;历史变迁;侗锦;亮布

中图分类号:TS 9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9)04-0342-05

Historical Changes of Ancient Dong Cloth and Its Technology

ZHANG Guoyun

(Design Academy,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ng cloth in ancient times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cloth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ere analyzed to find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rules. The skill methods of Dong cloth include knitting, dyeing, weaving and embroidering. They were formed from the changes of making garment by mixing grass, making garment by weaving cloth to colorful cloth. The material language and style symbol were also formed. It was found that it was not reasonable to take Liang cloth as the symbol of Dong cloth.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research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s and hand skills of traditional Dong cloth.

Key words: ancient Dong cloth, technology, historical changes, Dong brocade, bright cloth

侗族是中国百越民族中骆越人的后裔,在宋以前基本是混杂在百越中,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民族,主要聚居在湖南、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区域以及湖北的一部分地区。今侗族秦汉时期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隋唐以后有僚人、洞蛮、洞、峒等称呼^[1],自宋代开始从百越中独立出来,称为仡伶、仡纛,明清则以洞蛮、洞苗、峒人等称呼,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式称之为侗族。

侗布是侗族服饰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面料。侗族服饰经历了5个阶段,即用草叶、树皮蔽体,编结百草成衣的百越时期,种植葛、麻、棉,创造织机的隋唐时期,外来文明、服饰风格形成的宋元时期,

日常与礼仪服饰丰富发展的明清时期,延续和传承古代服饰的民国时期,形成了侗族自身所独有的民族服饰文化。侗布作为服饰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编结、染色、织造、刺绣等技艺的形成而产生了不同的样式,成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面料中必不可少的种类。

1 古侗族族群独立之前的服饰材料与技艺

1.1 编结、染色技艺形成——“卉衣”

文献史料中关于早期侗族服饰技艺的记载寥寥无几,且对技术工艺过程和形态也缺乏周详描

收稿日期:2018-06-07; 修订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G124)。

作者简介:张国云(1972—),女,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设计理论。Email:26474453@qq.com

述,依据目前掌握的文献可推测出卉衣主要材料为草木、藤蔓。在黔东南侗族地区流传的《侗族祖宗》歌词中有“树叶遮身”的记载:“树叶遮身兽肉当参,无人来问常操心。”^[2]黎平侗族《盘古歌》中也唱到:“……我们祖先原来是猿人,树叶置作衣……”^[3]歌中对于远古时期侗族先民纺织技术工艺无具体描述,但记录了其以树叶等草木之物为遮身蔽体的材料。草木之物,在《说文解字》中统称为“卉”,“卉”在《诗经》中亦指草木之意,如“卉木萋萋”。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提到南方少数民族“惟淮海扬州……岛夷卉服,蕨篚织贝”,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注:“卉服,葛越也,南方布名,用葛为之。”这里的卉服即以藤蔓等材料制作而成的服饰。在范曄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记载槃瓠之后裔:“镂体卉衣,凭深阻峭……”李贤注释“镂体”为文身,卉衣则是指穿在身上的草木之物。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卉服,絺葛之属。”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引《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绤’皆贵絺而贱绤,是絺精而绤粗,故云,精曰絺,粗曰绤。”^[4]《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广西桂州俚人之服:“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故夏书曰:“岛夷卉服,此之谓也。”综上可知,卉衣的材料从早期原始的树叶、藤蔓逐渐发展到珍贵的絺葛,卉衣是随着材料的发展而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百越民族早期服饰,亦是侗族先民的主要服饰。

关于“卉衣”的工艺,虽记载很少,但仍能从文献中找到一点踪迹。在《后汉书》中记载:“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裳,制裁皆有尾形。”^[5]其中“织绩”“染”“制裁”等词汇是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纺织技艺最早的记载。①“织”是在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侗族先民早期的纺织工艺以编结为主要手段,随着人们对编结技术的熟练掌握之后,逐渐发明了织机,使得早期的服饰技术从编结走向编织。②“绩”与“织”同时存在。“织绩木皮”中的“绩”在《说文解字》中释义:“绩,缉也,从系责声。”即把麻皮整理成丝线。段玉裁注:“绩,功也,从丝,责声……绩之言积也,积短为长,积少为多。”在裴渊《广州记》中记载少数民族服饰以木棉、藤蔓、竹等为材料:“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终藤,绩以为布。”贾耽、李吉甫《十道记》:“容州夷多夏少,鼻饮跣足……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其中的“缉”应等同于“绩”。《太平寰宇记》引用顾微《广州记》:“广西阿林县有勾芒,俚人砍其大树,新条更新,取其绩以为布,软滑甚好。”对中国南方百越民族服饰工艺的文献记载中,“绩”是出现较

多的一种技艺。由此推测,绩与织是古代服饰材料制作工艺最为主要的两种类型。③“染以草实”的“染”,在《说文解字》中裴光远释义为:“从木,木者所以染,梘、茜之属也;从九,九者染之数也。”可知百越民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有了“染”的技艺。

就中国百越民族的聚居区而言,两广和福建等地是侗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地,至今侗族地区依然有来自福建沿海、广西梧州、扬州水乡、江西吉安等之说^[6],因此可以推测“卉衣”亦是中国侗族先民的早期服饰形态,以草木、藤蔓织造而成的面料成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早期服饰面料的萌芽。

1.2 染、织技艺的发展——“斑布”

侗族先民从远古时期的编织技艺到秦汉时期的染色技艺,形成了从“卉衣”到“五色衣裳”的侗族服饰面料雏形。斑布则可以看作是“五色衣裳”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斑布,最早记载大概始于三国时期。如在《太平御览》卷8中转述了三国时期成书的《南州异物志》对斑布材料和制作工艺的描述:“五色斑布以(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7]隋唐时期的《南史·夷貊传上·西南夷》中记载“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8]《梁书·诸夷》中亦有斑布的记载:“林邑国……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纁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8]《隋书·地理志》中则记录:“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9]以上文献不仅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斑布的形成区域、材料特征,对斑布形成的技艺过程也进行了详细描述。

从区域来看,本节文献中提到的“西南夷”“林邑国”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聚居区域,尤其“沅陵、清江诸蛮”自秦汉以来就是百越民族中侗族先民生活的地方。由此推测,侗族先民不仅以斑布为饰,也是斑布的创造者之一。从纺织材料上分析,文献中所提及的“古贝木”“吉贝”为斑布材料,二者成熟时皆状如鹅毛,色泽洁白。“古贝木”“吉贝”皆是古时人们对棉花的一种称谓,由此可知,侗族先民在隋唐时期已经开始使用棉花作为斑布的纺织材料。关于技艺,文献中记载了斑布“但纺不绩”,将棉纤维纺成线,用“纺”代替了手工的“绩”,实现了线缕不易断折的效果。“染之五色,织以为布”的记载,又说明了斑布先染线缕,再织成色彩斑斓

的纹样。这种先染后织的工艺,使得斑布纹因织而成形。

综上,从远古时代卉衣到隋唐的斑布,侗布有了基本的样式;从早期树叶、藤葛到絺葛再到棉纤维,侗布材料种类越来越丰富,质地也越来越精细;从“绩”到“纺”、从编染到织染,织造技艺随着材料发展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发展,形成了拥有不同时代文化特征的侗布形态——斑布。

2 侗族独立后的服饰材料与技艺

宋代,侗族从百越民族中独立出来,被称之为侗伶、侗纛,因其聚居的区域不同形成了不同支系。不同支系的侗族族群纺织技艺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以织为主和以染为主两种方式,其服饰面料由早期“斑布”逐渐发展成新的样式——“綵”与“練”。

2.1 宋代侗布纺织技艺的表现——“綵”“練”“娘子布”

2.1.1 “綵” “綵”是宋代侗族服饰中独特且珍贵的一种面料,首见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器》,由丝绒材料织成,被称为土锦。在《岭外代答》有关于“綵”的记载:“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綵,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10]由文中的“白质方纹”,可知綵布的色彩为白色;“方纹”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中释义为“小方胜纹”,“方胜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是以两个菱形的两条边线中点为起点,相互叠加、重合而成的几何图形。就工艺而言,綵中“方纹”的形成,应是运用提花机织造时经纬线有规律的交错变换,使两菱形相互叠加,形成菱形为图,布面为底的符号样式。依据《侗族简史》记载:“北宋时靖州等地……纺织的斑细布、白练布、白绢等均负盛名……”^[11]综上,被称作土锦的“綵布”,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因织而形成的肌理纹样,与1.2中“斑布”因线缕染色而织成的五色斑纹在技艺上的侧重点不同,故形成了不同的样式。从綵的织造区域“邕州左、右溪峒”来看,在《岭外代答·地理门》中记载:“自宜西南,曰邕州,邕境极广,管溪峒羁縻州、县、峒数十。”^[10]“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10]同时,据文献记载,靖州自宋以来一直是侗族族群的聚居地,由此笔者推测,“綵”亦是宋代侗族族群以“织”为主的素色侗锦最初形态。

2.1.2 “練” 在《岭外代答·蛮俗门》中记载:“冬编鸟毛木棉,夏缉蕉竹、麻紵为衣……土产峒綵、練布……。”“練”,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为:“練出自两江州峒,大略似苧布,织有花,曰花

練。土人亦自贵重。”^[12]周去非《服用门》中对“練”的织造与材料亦进行了详细记载:“邕州左、右溪峒,地产苧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練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以染真红,尤易著色。”^[10]杨武泉校注曰:“苧麻,织物中之精品”。从上述文献可知,“两江州峒”即是指“邕州左右江”,是俚人、峒人的聚居区。“練”因技艺不同分为纺织而成的“花練”和染色而成的“红練”,其是用长而细的苧麻线纺织而成的上等布料。由此推测,練布是侗族服饰中的一种上等面料,其纺织技艺以纺与染为主要特色。

2.1.3 “娘子布” 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载:“僚言苧。今有绩织细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13]其内容与唐代李延寿《北史·僚传》所提及的“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较为接近。在《嘉靖钦州志》中有记载:土人、俚僚、峒人皆为骆越种类也。可见,娘子布亦为侗布的一种,以精细苧麻为原料。

综上,綵、練布、娘子布亦为中国西南地区侗族服饰中的主要材料,说明宋代侗布的样式已经多样,以织、染为主的织造技艺也逐渐丰富而精湛。

2.2 明代侗布染、织、绣技艺的表现——侗锦、侗绣

明清是侗族服饰面料技艺绩纱、纺织、染色、刺绣全面发展的时期。

2.2.1 绩、纺、织、染技艺体系已经形成 在沈瓚的《五溪蛮图志·土产篇》中记载:“丝、麻、棉花,绩纺为缕,以草木煎汁染五色织布。”^[14]在《风俗篇》中亦记载:“先以楮木皮为之布,今皆用丝、麻染成五色,只花绸、花布裁制服之。”文中记载了从织造的原材料处理,绩纺、草木染色到织成五色绸布的一系列工艺过程,说明明代五溪地区包括侗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服饰面料的传统手工技艺体系基本形成。同时彩色侗锦的织造技艺已经较为完善。如在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卷7)中记载:“黎平府属……织花紬如锦,斜缝一尖于上为盖头。”^[15]明代黎平府主要聚居的是侗族族群,因此“织花紬如锦”中的“锦”可看作是侗锦。“紬”同“绸”,则说明侗锦以丝为原料,相较于早期的斑布、綵等,侗锦的织造材料也更加丰富,在今天的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依然保留着彩色丝线织锦的技艺。综上,明清时期侗锦的材料包括丝、麻和棉等,其技艺则集古代绩纱、纺织、染色等于一体。

2.2.2 侗族服饰中绣的技艺在明代首次出现 在1.2节文献分析中提及的“织为斑布”“以斑布为

饰”等,在工艺上均以织为主而非绣,而刺绣技艺则在明代记载侗族的文献中出现。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卷4)中提及:“妇人短裙长袴,后垂刺绣一方,若绶胷(胸)亦如之……黎平府。”《贵州图经新志》(卷7)中亦记载侗族刺绣技艺与纹样特征:“黎平府属……妇女之衣,长袴短裙,裙作细褶裙,后加布一幅,刺绣杂文如绶,胸前又加绣布一方……”黎平府即是明代侗族聚居的主要区域,与现在贵州黎平苗侗族自治县是同一区域。文献中的“后垂刺绣一方”“刺绣杂文如绶”是有史以来首次对古代侗绣技艺与纹样的记载。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刺绣常被比拟为“以针为笔,以缣素为纸,以丝绒为朱墨铅黄,取材极约而所用甚广,绣即闺阁之翰墨也。”^[16]《广雅释詁》云:“‘刺,箴也。’绣成于箴功,故云刺绣。”^[17]《说文解字》中认为“针”由“箴”发展而来。从“箴”字的结构来看,“竹”为上部首,“咸”为下部首,其造字本义应该是指身体被竹针刺而产生的一种酸涩的感觉。因此,侗族先民的装扮“披发文身”中“文身”的含义,从工艺的角度看是早期南方百越民族的刺绣根源。

综上可以推测,明代不仅延续了早期的侗布纺织染工艺,而且进一步完善了以侗锦为代表的织工艺,同时,刺绣工艺的出现使侗布形态更为丰富。

2.3 清代侗布技艺的表现——重绣、重锦

清代是侗族服饰面料种类与技艺繁盛时期,“侗布”“侗锦”已经闻名于世。编结、染色、纺织、刺绣技艺在这一时期全面发展,由于不同侗族支系的生活环境和习俗有所不同,其侗布织造技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2.3.1 重绣 侧重刺绣技艺的族群的服饰则形成“重绣”风格。“重绣”是指侗族女子服饰面料以绣为主要技艺特征,“重绣”的风格以贵州地区为主。如嘉庆年间《百苗图》中贵州阳洞罗汉苗女子服饰:“妇人鬓髮散绾,插木梳于额,以金银作连环耳坠,胸前刺绣一方,银铜饰之……”^[18]《皇清职贡图》(卷8)中记载罗汉苗女子服饰“妇人散发绾……或止系长裙垂绣带一幅,曰衣尾,能养蚕织锦。”^[19]在光绪年间《黔南苗蛮图说》中则详细记录了贵州车寨侗人“工针黹”,即刺绣,其曰:“车寨苗,在古州城西北……即车江也。妇女椎髻,以花布缠首,短衣长裙,工针黹。”^[20]在《百苗图》第74种车寨苗也相应记载了“女子工针指”技艺。

2.3.2 织锦 侧重织锦的侗族族群,服饰材料则形成了“重锦”风格。“重锦”风格以贵州的榕江、黎平与天柱,湖南靖州、通道等侗族聚居地为主。如

在康熙年间,胡奉衡的《黎平竹枝词》就有“峒锦矜夸产古州”之句,古州即今天的榕江、黎平地区。至乾隆年间,贵州天柱的曹滴洞“侗锦”为最好,“精者甲他郡”“冻之水不败,渍之油不污”^[21]。至光绪年间,桂馥在《黔南苗蛮图说》第79种峒人条记载侗锦的特征:“峒人又名峒丁。冬以芦花为御寒,在镇远府及石阡郎溪司者,多以苗姓……所织之布曰峒布,细而有纹。”^[20]综上,在清代不同时期,侗布技艺在不同的侗族支系中各自发展繁荣。纺织技艺的全面发展与材料的多样,造就了清代侗布种类的繁多,同时,自织、自染、自绣的侗布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饰之用,亦是侗家人提高经济收入的一种手段。

2.4 民国时期侗族染织技艺表现——亮布

民国时期侗布以亮布为主。亮布,顾名思义即表面光滑且发亮的一种的棉麻布,色彩以暗红色为主,以蓝、红染以及表面刷浆形成光泽感为特征,其经多次染色、晾晒、蒸煮、捶打而成。若与侗锦“细而有纹”的特征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亮布强调表面的光滑与光泽感,亮布表面的质感是在染色、蒸煮、刷胶、捶打等过程中逐渐形成。在清以前的文献中,对侗布染色技艺有所提及,但均没有详细记载染色过程,直至民国时期,在刘锡蕃的《岭表纪蛮》中提到娘子布的染织过程:“自灰色化以下各种蛮族,所着衣裙,完全为其手制,故蛮人妇女,无不善纺织。其工细者,数月而成疋,曰‘娘子布’。其质为苧麻,染青色,九洗九染,布敝而色犹新。”^[22]这里“灰色化以下各种蛮族”是指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西南少数民族,侗族是其中之一。“娘子布”染织工艺为“染青色,九洗九染”,“青色”即蓝靛染织而成的色彩,“九”为多次,九洗九染为多次染色与清洗。与2.1.3节《溪蛮丛笑》中的“娘子布”对比可知,民国时期比宋时期的娘子布技艺更加复杂,尤其突出了染色技艺的过程和色彩特征,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新的侗布形态——亮布。

由此,笔者推测,染色技艺的创新是民国时期侗族亮布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侗族人在延续清代刺绣、织锦的基础上,突出“染”这一工艺特征,从而形成了新的侗布形态。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染的历史悠久,但侗族亮布的形成历史并不长,在当下许多区域的侗族,尤其是贵州的从江、黎平、榕江等地区的侗族,常常以亮布作为其古老的侗族服饰符号,是不妥当的。

3 结语

技艺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具有创

造性的思维活动 and 实践过程,包含着科学、技术、艺术、经济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古代侗族先民从结草成衣、织布制衣、五色斑布等造物过程中创造出编、染、织、绣等技艺手法,形成了侗族服饰的材料语言和造型符号,建立了上衣下裳为基本形制,以“包肚”“飘带”为服饰配件,以银饰、刺绣、织锦为装饰风格的服饰体系。由此,侗族服饰面料的发展历史也是技术的发展史,它伴随着侗族族群的发展一步步向前迈进,在每个历史阶段不同技术的出现和完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侗族服饰织造技艺。

参考文献:

- [1] 黄才贵. 侗族族源初探[J]. 民族学研究, 1982, 2(1): 78-97.
HUANG Caigu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igin of Dong nationality[J]. Ethnic Study, 1982, 2(1): 78-97. (in Chinese)
- [2] 王胜先. 侗族文化与习俗[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9: 14, 42.
- [3] 姜大谦. 论侗族纺织文化[J]. 贵州民族研究, 1991, 12(2): 64-70.
JIANG Daqian. On Dong textile culture [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1991, 12(2): 64-70. (in Chinese)
- [4]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2.
- [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574.
- [6] 张柏如. 侗族服饰艺术探秘[M]. 台湾: 汉声杂志, 1994.
- [7] 胡进, 简小娅. 斑布考——兼谈蜡染[J]. 贵州文史丛刊, 2001(2): 41-45.
HU Jin, JIAN Xiaoya. Banbu test—talking about batik [J]. Gui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2001(2): 41-45. (in Chinese)
- [8]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958.
- [9] 魏徵.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98.
- [10] 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4, 133, 223, 225.
- [11] 《侗族简史》编写组. 侗族简史[M]. 贵阳: 民族出版社, 2008: 34.
- [12] 范成大. 桂海虞横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1.
- [13] 朱辅撰. 溪蛮丛笑[M]//季羨林, 徐丽华.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14] 沈瓚. 五溪蛮图志[M]. 李涌, 重编. 陈心传, 补编. 伍新福,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113.
- [15] 沈痒, 赵瓚. 贵州图经新志[M]. 张祥光, 点校.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
- [16] 张朵朵. “绣”的书写[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17] 孙治让. 周礼正义: 第79卷[M]. 王文锦, 陈玉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307-3308.
- [18] 李德龙. 黔南苗蛮图说[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 [19] 傅恒. 皇清职贡图[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8.
- [20] 李德龙. 黔南苗蛮图说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 [21] 张澍. 续黔书: 第6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6.
- [22] 刘锡蕃. 岭表纪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131.
(责任编辑: 卢杰)